

#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文\_马社香

我国东海航空识别区的建立，立意深远，人心大快，当然也有反对声音。但联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舆论诽谤围攻、地缘包围、外国军舰肆无忌惮地进驻台湾的状况，今天我们一则为新中国冲破重围崛起而自豪；二则必须注意历史经验，重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年如何凝聚党心民心，众志成城。特别是我们应从学习党史的角度，认真了解当年农业合作化为何推进得那么早、那么快，其中地缘政治战略的考量也是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回顾历史，有三点需要特别强调和澄清。

## 一、美军进驻中国台湾、联合国经济制裁新中国，推动毛泽东明确支持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揭开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美国第七舰队27日进驻中国台湾。7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在台北发表联合声明，签署“防卫协定”。8月，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案”。9月，美军仁川登陆打到鸭绿江边。10月，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国迅速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侵略朝鲜案”。12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我“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案”；通过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同时联合40余国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和经济制裁。在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中国面临两条路，一是俯首称臣，撒手台湾；二是快速整合国力奋起抗争。新中国

成立之初，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如何快速整合？农业国自然从农业抓起。依据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组的经验，山西老区自发办起了农业合作社，对此华北局和山西省委有不同意见。山西省委支持办农业社，重点在于“以避免互助组涣散，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华北局不同意见很明确，说按照党中央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精神，“15年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两种意见报毛泽东最后定夺。1951年毛泽东的认识与1948年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我国整个地缘政治环境有了新的重大变化，敌变我变。1951年7月下旬，毛泽东与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刘澜涛曾在日记中记载：“毛主席说 I 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你们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我不得不向你们表示，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赖若愚同志的看法。”随后，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党内颁布，推动全国各地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不断涌现，国内掀起爱国增产热潮；进一步激发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挺住反复拉锯的艰难时刻，全面粉碎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客观上加强了新中国对“旧金山体制”的战略回应。

## 二、“旧金山体制”客观上推动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农业合作社

“旧金山体制”缘于1951年9月4日至8日，美国在

旧金山主持对日单独媾和会议。这个会议排除了中国等主要参战国参加，旨在“扶植日本，遏制和分裂中国，控制亚洲”。在旧金山会议前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缔结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28日，美日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对日和约生效。同日，日本与中国台湾签订《中日和约》，精心构筑了分裂新中国的战略态势。

在地缘环境不断恶劣的情况下，新中国只有进一步整合国力才能摆脱被分裂的命运。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增产节约，抗美援朝是总的方针”。1953年8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以农业合作化为基础，全面整合国力，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旧金山体制”的战略对峙落实到具体议程。

### 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在地缘战略上撬动农业合作化高潮迭起

我党地缘战略思考源于其时我国地缘被围堵的状况。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新中国威望大增。1954年春，新中国被邀请参加日内瓦会议，受到爱好和平的诸多国家的拥戴，但同时又遭到新的围堵。1953年10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5月，《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签订；9月，美、英、法、澳、菲、新、泰、巴八国《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5年1月，美国与巴基斯坦防御援助协定签订。2月23日至25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举行理事会会议，决定对柬埔寨、老挝、南越进行“援助”。2月26日至3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后到缅甸、老挝、南越、柬埔寨活动。1955年5月16日，美国与柬埔寨军事援助协定签订。至此，美国基本完成了对新中国的“C型”包围圈。

面对新的困局，新中国一方面冲破重重阻力出席1955年4月万隆会议，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另一方面，1955

年5月17日，毛泽东主持15省、市委书记会议，面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强调农业合作化与解放台湾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在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讲到“统购统销粮食工作有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四利城工（城市工人），五利打台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国家主权与地缘战略相结合的制高点，以期以加快农业合作化来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凝聚民心，获得与敌对势力战略对峙的物质基础。现在有人说当年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地缘环境不断恶化这段大背景。新中国当年若不想做他国的附庸，就要坚决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反复强调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十余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集团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上掀起了一个与华建交的新高潮。历史证明了当年新中国推进农业合作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地缘政治战略考量的前瞻性。由此看来，1955年至1956年面对险恶复杂的地缘环境，必须凝聚国力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当年不可忽略的重要地缘战略考量，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国治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的制高点。

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各地不论条件“一窝蜂”争抢成立高级社，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能成为今天质疑或否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破口，更不能成为质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简而言之，立国治国地缘政治战略固然与战役战术成败分不开，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其战役战术出现的问题是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而不是以某个战役或战术未跟上或出现问题，全盘否定这个大战略。如果那样就脱离了当年险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脱离当时的实际，也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历史是现实之师，面对东海航空识别区周边的某些异议，观往知来启示良多。■

（作者：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 史小今）